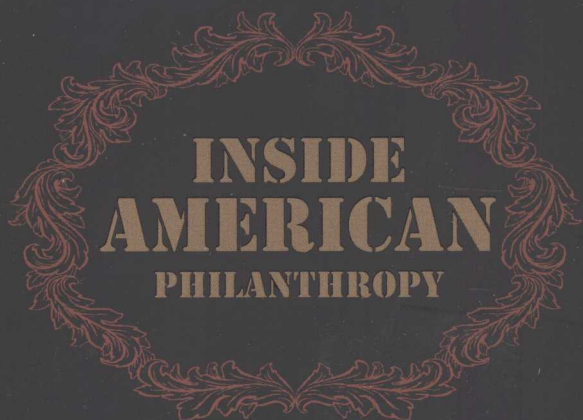




一位慈善业直言不讳的观察家，
首次剥开公益机构庄严堂皇的外表，揭露鲜为人知的内幕。

大捐赠者传奇

Waldemar Nielsen

[美] 沃尔德马·尼尔森◎著

程迺欣 郑胜天◎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014005423

K837.123
02



**INSIDE
AMERICAN
PHILANTHROPY**

K837.123
02



北航

C1693341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捐赠者传奇 / (美) 尼尔森(Nielsen, W. A) 著;
程迺欣, 郑胜天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11

书名原文: Inside American philanthropy: The
dramas of donorship

ISBN 978-7-308-12402-7

I. ①大… II. ①尼…②程…③郑… III. ①慈善事
业—人物研究—美国 IV. ①K837. 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9341 号

Copyright © 1996 by 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Norman, Publishing Division of
the Universit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1—2013—124 号

大捐赠者传奇

(美) 沃尔德马·尼尔森 著 程迺欣 郑胜天 译

策 划 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陈丽霞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189 千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2402-7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北航

C1693341

014002433

我们应该倾尽我们宝贵的一生，只为了买和卖？只为了将今年的销售额与去年同期作对比？只为了在舞池中拖曳着舞步？只为了打打牌，集齐三个J、三个A，或者三个K？只为了寻欢作乐、抵制征税？而当临终之际到来，以留下一处尽可能少课税的房产为我们一生的胜利和成就？诚然，我们的生命中一定有某种更美好的东西，某种能让生命更显高贵的东西，它能让我们的一生沾染上哪怕一点点神圣的色彩。

我的朋友们，正是无私的付出和于人有利的善举让我们的生命更显高贵，而其中的原因并不在于此举能为他人带去什么，更多的原因在于这么做能为我们带来的回报。正是因为这种精神，我们应该毫不吝惜、毫不小气地捐赠我们的所有，我们应该愉快地、慷慨地、热切地、充满爱意地、满心喜悦地去做这件事情，而这样的心情也正是生命能带给我们的无上的愉悦。

——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

1923 年

致中文读者

当我回顾自己以往的岁月时，发现自己对中国的兴趣始于童年时代，那时我第一次读到马可·波罗的游记。我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一名年轻的海军军官，我受政府委派运送食物和药品到上海的欧洲居民区。然而，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有机会广泛地到中国各地旅行。

我曾担任罗伯特·安德森 (Robert Anderson) 先生的助理多年，他当时是大西洋富田公司 [Atlantic Richfield Co. (ARCO)，以下简称阿科公司] 的董事长。夏天，我们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人文研究所并肩共事，两人对艺术都一直很有兴趣。在他的鼓励和郑胜天先生的帮助下，我得以前往中国考察那里的美术院校，参观青年画家的作品，并且选择收集了一批作品送到美国展览。

为了实现目标，我知道自己需要有一位既了解中国艺术和美术院校，又懂得中国国情之人的帮助。我很幸运地找到了胜天，他会说几种不同的中国方言，也在美国进修过英语。他既是我的向导兼翻译，也成了我的朋友。如果没有他的协助和专业建议，1987 年在美国的那次重要的中国艺术展览是不可能举行

的。展览的名称叫做“开门之后”^①，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多种多样的绘画风格。这次展览的成果之一是为许多中国艺术家打开了在美国，乃至世界许多其他地区销售他们作品的大门。能够帮助年轻的中国艺术家走向国际市场，使我感到非常欣慰。

自这次展览以后，胜天和我一直保持着友谊和密切的联系。但当我得知他把这本有关公益事业的著作翻译成了中文时，我还是惊喜莫名。十年以前我曾帮助过中国艺术家，我希望这个译本也会有助于正在从事自己事业的读者们，但愿本书的内容能给予他们一些启示和借鉴。

沃尔德马·尼尔森

^①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亚太博物馆，1987年。

前 言

这本书所要讲的是我关于美国基金会和公益事业的个人思考和评判。虽然它主要是写给那些正在致力于筹建和改进基金会的慈善家们看的，但对于在公益事业工作的个人，以及那些对我们的多元制度中这一特殊部分感兴趣的人而言，这本书同样值得一读。

近几年来，因为不同寻常的机会，我有幸结识了相当多的美国富豪，他们都处于创办基金会的阵痛之中。虽然我已经投身于创办基金会许多年了，与他们的交往还是开启了一段令人惊异的发现之旅。

普遍流行的观点——或者说错误的观点是——基金会都是一群有目的的、博爱的捐赠者们依靠冷静的计算和理智创建起来的。但我如今逐渐明白，在很多情况下，它们都源自人们能想象得到的最个人化、最情感化的因素：对死亡的恐惧、渴望被铭记、纠缠不清的家庭关系、权力斗争、罪恶感、虚荣心、旧时的愤恨，以及新的幻想。它们有时候是精心规划和预先策划的硕果，但在许多情况下它们都是疏忽、冲动、个人癖好或者临终遗愿的产物。

美国多元体系下这些重要而独特的美国社会产物是情感和谋划共同催生的产物。这或许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基金会成功得异常耀眼，而另一些则损失极为严重——还有一些则居于两者之间。

因此，这本书就是要试着向人们展现基金会内含的人性的一面。本书中所记录的这些关于捐赠的戏剧性故事，挑战着人们先前关于慈善机构的苍白的、充满敬意的、墨守成规的、官僚主义的、被理智化的解读，同时也让我们离真相更近了一步。

我想借此表达对甘尼特一家、洛克菲勒兄弟、约翰·洛克菲勒三世、利奥·莫德尔以及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的感谢，感谢他们为我的工作提供财政支持。同样还要感谢阿斯本研究所，它成了我研究基地。

此外，我还想向海内外为我提供智力支持的朋友们表达谢意。他们是英国的约翰·加德纳、玛格丽特·马奥尼、伊丽莎白·麦科马克、西沃恩·奥本海默·尼古劳、斯蒂芬·格劳巴德、阿萨·布里格斯，西班牙的朱利安·马里斯和乔斯·安东尼奥·穆尼奥斯·罗哈斯，还有已故的保罗·伊尔维萨克。他们的建议和想法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沃尔德马·尼尔森

于纽约

代序：“花钱更比挣钱难”

1997年夏日的的一个晚上，我与老朋友沃尔德马·尼尔森先生在他位于曼哈顿第五大道旁的寓所中聊天。他说出了一句惊人之语：“花钱更比挣钱难。”然后拿出一本书给我，说这是他最近，也可能是今生最后的一部著作，相信会对某些人有用处。我从纽约飞回温哥华的途中，带着消磨时间的态度翻读起来，却越读越觉得有意思，也终于明白了他的话。

尼尔森早年是一位外交官、非洲问题专家。退出政界后，他长期研究美国的公益事业，担任过洛克菲勒三世（John Rockefeller III）、保罗·格蒂（Jean Paul Getty）、罗伯特·安德森（Robert Anderson）等大富豪及许多企业和基金会的顾问。近年来他致力于著述，先后出版了三部分析评介美国基金会的专著，它们已成为这个领域中最具权威性的参考书。现在他年逾八十，这第四本《大捐赠者传奇》（*Inside American Philanthropy: The Dramas of Donorship*），可说是他半生经验的全面总结。

尼尔森在英文原书的前言中写道：“这本书所要讲的是我关于美国基金会和

公益事业的个人思考和评判。虽然它主要是写给那些正在致力于筹建和改进基金会的慈善家们看的，但对于在公益事业工作的个人，以及那些对我们的多元制度中这一特殊部分感兴趣的人而言，这本书同样值得一读。”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指出：“没有人比沃尔德马·尼尔森更了解美国的基金会。数十年来，他一直是一位关于公益、基金会事业的直率可信的评论家。他了解公益事业的巨大成就、它的不足之处以及内部的丑闻。而且，他写来绝不枯燥乏味。”洛克菲勒家族机构的伊丽莎白·麦科马克（Elizabeth McCormack）说：“沃尔德马·尼尔森对公益事业内情洞察入微的研究将回答关心这一领域的读者的许多问题，引发他们的好奇心。捐赠者和受赠者都会从这本书中得益。”

他说他介入基金会的工作已很多年，近年来有机会结识了一些想要设立基金会的有钱人，发现其动机不少是出于个人或感情的原因：如惧怕死亡、希望身后留名，或者因为家族不睦、权力争夺、负罪感、虚荣心、旧的怨恨或新的梦想等。固然许多基金会都是经过慎重筹划而成的，但也有相当数量是草率从事、一时冲动、异想天开，甚至是临终前绝望的产物。因此，在众多的美国基金会中，有的办得光彩出色，有的却一团混乱，而更多的则是介乎这两者之间。

尼尔森希望这本书能够展示基金会事业人性的一面，让读者透过许多庄严堂皇的公益机构的外观，去了解这些向社会作出捐赠的人士的戏剧性的真实故事，知道一点办公益事业的酸甜苦辣，体会一番慈善家们的艰辛。

据经济学家估计，当今全世界华人的资产总额已经可以与美国、日本或欧盟相抗衡，不少华人富豪和华资企业已跻身世界前列，他们已完全有能力也愿意对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华人世界固然历来有济贫扶弱的行善传统，但以现代基金会的形式去主动积极地服务社会，还是一件新鲜事物。正如尼尔森在书中所描述，现代的私人基金会已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发展教育、医疗、文化艺术、科学

研究，甚至提供国际援助、维持世界和平等责任。这些一向被认为是政府的职能，有时由私人机构运作反而更有成效。尼尔森认为，21世纪，私人基金会的地位会更加重要。对于已拥有相当大一部分人类财富并准备作出奉献的华人来说，参与创建和管理基金会的事业，是一份光荣，但同时也是一项挑战。

当我向朋友们转述“花钱更比挣钱难”这句话时，他们都惊异地望着我，好像我是天外来客。我相信如果他们能和我一样耐心读完这本书，就不会反对尼尔森先生的看法了。在当今这个世界，要赚钱固然并不容易，但当一大笔可观的财富放在你的面前，要把它花到最需要的地方，花得有价值、有效率，对社会有确实的益处，自己从中也得到快乐和成就感，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

感谢尼尔森先生欣然同意我把他的这部著作翻译成中文，更要由衷地谢谢我的大嫂迺欣姐，趁她来温哥华访问之际，我要求她“拔刀相助”。没有她的参与，这本书恐怕至今还没有译完。更不用说她的双语学识和细心认真，使这个译本增色不少。大哥海天是位资深的编辑，居然甘心权充助手，每日将迺欣姐的手稿输入电脑，乐此不疲，令我十分感动。谈到译书的动机，我必须要对王梁洁华女士表示衷心的感谢。承蒙她的信任，近几年来，我得以荣幸地参与梁洁华艺术基金会的创建和管理工作，这一段宝贵的经验大大增强了我了解美国基金会的历史和现实的愿望。最后，我还必须感谢帮助本书中文译本出版的人士和机构，特别是台湾《典藏》杂志社的社长简秀枝女士。希望我们这点小小的努力能够对有心于公益事业的人有所帮助。

郑胜天

千禧岁末于温哥华

译者序：春寒三月忆故人

——记中国艺术的朋友尼尔森先生*

2005年阴雨连绵的年尾，我收到尼尔森夫人从纽约寄来的一封短笺：“本该寄上一张圣诞贺卡，我却不得不告诉你这个不幸的消息：沃利在11月2日因阿兹海默并发症去世。他住院了两个星期，离开时十分平静，毫无痛苦。我女婿说：‘他已准备好要走了。’我也感到如此。”

沃利是家人朋友对沃尔德马·尼尔森先生的昵称。《纽约时报》刊登他去世消息时的标题是：慈善界失去了一位“巨人”。其实，尼尔森不仅是美国慈善事业中受人敬重的专家，也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对世界卓有贡献的当代知识分子。在他色彩丰富的一生中，可能最不为人知的一部分，就是他晚年对中国艺术的热爱，以及从20世纪80年代起向西方介绍当代中国艺术所付出的不懈努力。中国前卫艺术的“老近卫军”们大概都记得当年这位高大银发的老外访问

* 原载于《典藏·今艺术》2006年第4期。

他们的情景。尼尔森是改革开放以后推动中外艺术交流的先行者之一。当今天中国艺术在国际艺坛已经令人刮目相看的时候，他的远见和贡献应当得到充分的评价。

1917年，尼尔森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格林堡。1939年，他从密苏里大学毕业时取得去牛津大学深造的罗德奖学金，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未能成行。1940年，他加入了政府机构工作，之后美国参战时他作为一名雷达军官在太平洋地区服役。战后他担任过商务部长特别助理和美国国务院驻欧洲的主管，是“马歇尔计划”主要执行人之一。1952年，他被聘为福特基金会副总裁，负责国内外的许多重大项目；后被选为非洲—美洲研究会（Africa-America Institute）主席，在他领导的十年中，该机构对新一代非洲领导人的培训提供了关键性的协助和支持。尼尔森所写的三本有关非洲的书是对后殖民时期非洲新兴国家很具权威性的分析，不过他最有社会影响力的作品还是关于慈善事业的论著。1972年，他的《大基金会》（*The Big Foundations*）一书出版，引起相当大的轰动。因为在此之前，还从未有人揭开过这些富甲一方的豪门显贵所创立的超级机构的内幕。私人基金会是社会的“恩人”，也从不需受公众的监督，所以总是笼罩在一片神秘的面纱之下。尼尔森首次以翔实材料和尖锐的洞察力分析了美国主要基金会的历史与现状、成就与缺憾。他对慈善事业的重视和推崇毋庸置疑，但直率的揭露与批评也毫不留情，虽然使不少人深感不快，尼尔森却从此得到了“慈善事业直言不讳的观察家”的声誉。这本书和他之后出版的《黄金捐赠者：大基金会的最新剖析》（*Golden Donors: A New Anatomy of the Great Foundations*）、《面临危机的事业》（*The Endangered Sector*）等书对美国慈善基金会的改革和管理现代化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20世纪90年代他又以深入浅出的笔法写了《大捐赠者传奇》一书，让更广泛的公众来了解美国社会和经济的这一重要组成部分。我曾将此书译成中文，于2001年由《典藏》杂志社出版。

简秀枝社长和我专门为此去拜访尼尔森。老人用颤抖的手为中文版扉页签了名。在致中国读者的信中他说：“十年以前我曾帮助过中国艺术家，我希望这个译本也会有助于正在从事自己事业的读者们，但愿本书的内容能给予他们一些启示和借鉴。”

尼尔森的中国缘始于半个世纪前。他回忆说：“我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一名年轻的海军军官，我受政府委派运送食物和药品到上海的欧洲居民区。”他常说起那时亲眼目睹中国的战乱和贫瘠，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一直都想重游中国，然而等了40多年这一愿望才得以实现。

1985年我在杭州的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主持油画系并兼管国际交流，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属下亚洲文化协会的华敏臻女士（Michelle Vosper）告诉我，她要与一位朋友一起来参观国内的美术院校。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沃利。他穿一身卡其便装，潇洒而有风度。我陪他们参观了杭州、上海、南京等地的美术学院，见了许多不同年龄层的艺术家。虽然沃利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好奇心和敏锐的观察力使他注意到了刚刚开始释放出来的中国新艺术创造潜能。他总是兴致勃勃，在工作室中或展览会上，由衷的欣喜溢于言表。

他这次考察得到了石油巨子罗伯特·安德森的支持。沃利担任安德森的助手多年，又与他在阿斯彭人文研究所共事，两人对艺术都很着迷。安德森的阿科公司这时已参与了中国的石油勘探，并且赞助过一个在中国举行的美国艺术展览。正是在阿科公司的资助之下，沃利收集了一些绘画作品带回美国，促成了在美国最早一次中国当代艺术展览会的举行。

那时候虽然中国的“85新潮”方兴未艾，但还几乎没有西方策展人或批评家来中国考察过，欧美的主流美术馆想都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把中国艺术列入展览日程。在沃利和一些热心人士的努力下，“开门之后——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

代绘画”展览于1987年夏天在洛杉矶附近帕萨迪纳的亚太博物馆开幕，展出了沪杭宁地区艺术家的46件作品，其中包括耿建翊、张培力、许江、汪建伟、陈钧德、俞晓夫、戴恒扬、孔柏基、陈家冷、刘国辉、沈行工、王公懿等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都很令人瞩目的名家，也包括一些不太知名的年轻艺术家。正如沃利在展览画册中所说：“这不仅是一个艺术展览，也是为了使人们了解在当前中国关键性的变革时刻艺术方面的概况，以及艺术家，尤其是青年艺术家的面貌。”从这个角度来说，展览的确展现了在各种流派影响下新旧交替、多元共生的中国的80年代。沃利还请了前国务卿基辛格为画册作序。基辛格指出，新一代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是观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好棱镜。

继“开门之后”，阿科公司于1991年又赞助亚太博物馆举办了第二次当代中国艺术的展览“我不想与塞尚玩牌”。馆长卡曼斯基（David L. Kamansky）和策展人、加利福尼亚大学司特拉斯伯格教授在《美术》杂志编辑唐庆年的协助下多次来中国挑选作品。这次展览介绍了徐冰、王广义、张晓刚、吕胜中、魏光庆、喻红等重要艺术家。两次展览都有画册和论文，在当时实属难得。沃利虽然没有参与第二次展览的筹划，但他最早穿针引线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

在20世纪80年代，沃利差不多年年都来中国。他不仅自己发起或支持一些有意义的展览和活动，还运用他在慈善界的人脉介绍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家介入中国艺术界，如促使美国最大的纸板制造商奥斯曼（Mr. Osman）先生赞助在杭州举行的“'88中国油画邀请展”，邀请著名慈善家考夫曼夫人（Lillian Kaufman）来华访问和赞助中国艺术赴美的展览等。沃利思想非常活跃，虽然他本人是一位学者，但却敏锐地意识到了市场对艺术发展的重要性，意外地成了把中国艺术家推向世界的开路先锋之一。有经济学家指出，月收入在3000美元以上的阶层才可能收藏艺术品，当时中国的经济条件显然还无法形成艺术购买力。沃利认为把中国艺术品介绍到国外市场去是完全可行的，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帮助

打开这条途径，列斯特（Leicester）就是由他介绍而来的一位美国画商。这位犹太裔的画廊老板十分精明能干，以前曾代理过欧洲和墨西哥艺术家的作品，他利用地区之间的差价赢利，经营得相当成功。他一眼就看到了中国画家的市场潜力，但他觉得画家使用的材料质量难以国外买家所接受，曾不辞辛苦，亲自携带十多箱画布和颜料到国内城市，免费提供给艺术家使用。列斯特和中国艺术的接触让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越洋登陆，于香港创办亚洲艺术博览会，把这一当代艺术展销的模式引进到亚洲来，称得上是国际艺术市场的一大手笔。亚洲艺博会连续办了三届，到香港回归前才告中断。

20世纪80年代末，沃利感到有必要建立一个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长期性支持的体制，就联络了几位友人，并邀我一起筹组了一个非营利的团体“国际艺术研究会”（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Arts，以下简称IIA）。为了吸引更广泛的支持，他邀请法国蓬皮杜总统夫人（Claude Pompidou）、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特利（Donatelli）、芝加哥市文化专员哈里斯（Harris）、英国泰德美术馆董事布洛克（Bullock）、亚太博物馆馆长卡曼斯基（Manski）等组成高知名度的顾问委员会。IIA最初介入的活动之一是资助浙江“世界美术研究会”创办了一份刊物《世界美术信息》。这是一份以介绍国外艺术动态为主的专业“参考消息”，约每月出版一期。中国当时虽有几份介绍国外艺术的期刊，但翻译出版的周期比较长，有相当大的时间差。这份小报强调信息的及时性，因此受到了美术界的欢迎。另一件有意义的活动就是协助在杭州举办一年一度的“全国水彩·粉画展”，IIA赞助设立了几个奖项，还安排优秀的作品到美国展览。这项展览持续举行了很多年，推出了不少新人，对这个当时不太被重视的画种的复兴和发展起了很积极的作用。

1989年春，沃利专程去北京与有关部门和单位商谈今后长期的合作项目。我曾和他一起拜会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冯其庸副院长，双方同意成为合作伙伴，并

就计划的一些项目达成了共识。沃利对此感到十分乐观和振奋。在后来去成都、重庆等地的旅途中，他多次提到要尽快为 IIA 筹集一笔可观的基金，以便长期持续地开展活动。可惜的是，他的旅行和美好的设想由于骤然的形势变化而被迫中断。沃利在 4 月 7 日从上海虹桥机场登机回国，他满眼含泪，无限惆怅地和我握手道别。

此后中美之间的文化合作停顿了一段时期，不少官方和民间的交流项目都被搁置起来。由于前景莫测，IIA 也失去了继续建构完善的动力而不幸半途夭折。不过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沃利还是利用他个人的影响帮助办成了一些事。例如 1991 年我策划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举办“第一届中国美术创作研讨会”和成立工作坊，为海内外中国艺术家提供一个切磋交流的机会。沃利作为“美中艺术交流委员会”的理事，给那次为期一月的活动争取到了大部分经费。徐冰和陈丹青等不少艺术家都在工作坊期间创作出了很有分量的作品。沃利还帮助过其他一些中国艺术在美国的有关活动，但这时他的精力已开始减退。正当新一轮的中国艺术热在海外日益升温的时候，他却渐渐淡出了这个圈子。

我最后一次去探望沃利是 2004 年春天。我在曼哈顿离他家不远公园大道上的亚洲协会博物馆听讲座，散会后约了邱志杰一起去探望这位世纪老人。那时沃利已经卧床不起，但头脑还很清醒。邱志杰用他须臾不离身的录影机，录下了这间挂满了中国艺术家作品的居所，录下了五月下午残留在红砖院墙上的阳光，也录下了老人清癯的脸上凝结的笑容。邱志杰可能已经意识到，他是在为 20 世纪中国美术史上这一段逐渐褪色的历史，保留下珍贵的最后一页。

郑胜天